

July 2014

How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Entered China and Inserted Influences?

Liyuan Zh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u, Liyuan. 2014. "How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Entered China and Inserted Influenc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4): pp.6-1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4/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后现代主义文论是如何进入中国和发生影响的？

朱立元

摘要：本文回顾、考察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至今逐步进入中国并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五个阶段；以大量实证材料客观地揭示出这种影响是在文艺理论界对后现代文论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中发生发展的，而不是单向地盲目接受和生搬硬套；以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讨论为例，阐明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同时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错综复杂、交织互动的特点。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文论；进入中国；影响

作者简介：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为文艺学、美学，具体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西比较文论和美学等。电子邮箱：wwyingb@163.com

Title: How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Entered China and Inserted Influenc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examines the five stages during which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currents gradually entered China and exerted influences since the 1980s. With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empirical evidence,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fluences of the Western postmodernism filtered slowly through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rocess during which Chinese theoretical circle did not unreservedly embrace the theories but accepted the influences through borrowing and assimilation, refutation and criticism. The paper takes the essentialist way of thinking as an example and expoun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which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ies have on Chinese theories.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literary theories; theoretical entrance into China; influence

Author: Zhu Liyuan i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aesthetics and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Email: wwyingb@163.com

上世纪中期开始活跃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在 80 年代初开始引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持续不断的译介、批判、争论和接受，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事实上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讨新时期到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实绩和问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这一块的重要影响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进入，在一系列重要方面改变了世纪之交中国文论发展的格局。关于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产生的积极和消极

双重影响，笔者已另文阐述，本文拟主要探讨后现代主义文论是如何进入中国、又是如何发生影响的问题。

一、简要回顾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进入中国的五个阶段

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考察一下新时期以来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进入中国和中国文论对之的接受过程和发展轨迹。具体而言，我们大致依时

间顺序,将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进入中国的历程分为五个时期,即第一阶段发生期(1979—1985年)、第二阶段发展期(1986—1990年)、第三阶段推进期(1991—1995年)、第四阶段高潮期(1996—2000年)和第五阶段新变期(2001年至今)。

1. 第一阶段发生期(1979—1985年)。

这一阶段,后现代主义文论作为一种异质思想文化,主要通过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初步、少量的译介开始传入中国,相关译介主要围绕着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本身。学界以一种颇为陌生、却充满好奇感的姿态观望着这一在西方已经发展多年、但对国人而言尚属新鲜的思潮。这样的译介为稍后该思潮进一步登陆中国吹响了号角。

2. 第二阶段发展期(1986—1990年)。

这一阶段国内文论界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文论方面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开始由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逐渐向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领域扩展,涌现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论文和译文。约略统计,这一阶段,国内共发表以“后现代主义”为主题词的学术论文近80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涉及文学艺术的。《文艺报》、《文论报》、《文学报》等专业报纸也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有不同程度的介绍,有的刊物还发表了外国学者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长篇论文。如《当代外国艺术》第十二辑“编者按”很有见地地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近年来欧美艺术文化中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围绕后现代主义问题,目前还存在颇多争论,它究竟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还是现代主义的深化,正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结合,是对现代主义的扬弃,从实质看,与其说是“后现代”,毋宁说是“现代后”;也有意见认为,后现代主义保留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基本特征,为适应后工业社会需求而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这一现象不仅涉及文化艺术问题,也应从社会思潮、哲学思潮等方面加以考察。这就为国内文论界有批判地吸取后现代主义文论,拓宽了视野。

3. 第三阶段推进期(1991—1995年)。

对包括文论在内的中国人文学界来说,1980年代在整体上是一个意气风发、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启蒙热情后,文论界开始逐渐从理想主义方向走向更趋务实的经验主义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文论思

潮进入全面登陆与铺开阶段,呈现出了论著密集、话题热烈、意见分歧、参与面极为广泛等醒目特征。约略统计,这一阶段,国内共发表以“后现代主义”为主题词的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涉及文学艺术的,还出现了多部中国学者直接论述后现代主义(包括文论思潮在内)的著作。^①而且,几乎当时国内文论界老中青三代所有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该阶段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这一接受进程,一方面为之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尝试着使之更为有效地为我们所用。整体而言,这一阶段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于开阔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改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其正面积极意义是大于负面消极意义的。

4. 第四阶段高潮期(1996—2000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在这一阶段蓬勃发展,现代消费社会的某些特征开始出现,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思想上追求小康、求稳务实的心态被普遍接受,文化上追逐时尚、标新立异而不求思想深度的社会风气愈益盛行。这些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品格有某种相符和叠合,具备了与之发生共振的思想氛围和文化空间。在这样的语境中,国内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接受达到了高潮,发表的相关论文超过400篇;而且,更多的文艺理论学者及一批相关研究领域研究的学者,包括研究文学史(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加入到了这一问题的探讨行列中来,使该话题逐渐趋于白热化和应用化。这一阶段中,国内学者出版的直接关涉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的著作也明显增加,^②这些现象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后现代主义文论与转型期国内审美文化等问题的讨论也发生了共振,开始被置于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加以考察,这一方面预示着国内文化研究热潮即将来临,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这两股思潮合流的趋势。

5. 第五阶段新变期(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接受开始明显地向文化研究方向嬗变。具备浓厚后现代色彩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探讨和争鸣,掀起了后现代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接受史上的新一轮冲击波。换言之,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最为活跃的这十多年中,

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对中国文论的影响获得了新的动力,是它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获得纵深发展的一个时期。这一阶段,不但发表相关主题的论文多达400余篇,出版的相关著、译作也有数十部之多,^③而且,比起前几个阶段,这些论文、著作在学术质量上有明显提高。

这一阶段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方面呈现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接受面更为宽广,文学理论、美学、文化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批评诸领域,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劲辐射,并积极作出自己的调整性反应,质言之,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中国化进程更趋深入。二是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集中、专门的新变形态——文化研究,更确切地说,是文化研究在新世纪中国学界的蓬勃兴起进一步激活和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新世纪中国学界的传播,扩大了其影响。三是不同观念之间的交锋更趋激烈,例如围绕“反本质主义”这一被许多后现代主义文论倡导者奉为旗帜的思想观念,就引发了文艺理论界一大批学者的关注和一系列相关重要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部分年长一辈的文论学者与中青年文论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争鸣。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影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二、影响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中发生发展

上面五个阶段的简要回顾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是一帆风顺、一路向上的。事实恰恰相反,它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其整个过程是充满曲折和矛盾的,有时候是相当隐秘的。首先,这种影响体现为一种历时的渐进的过程,在新时期以来、主要是1990年代以来的不同时期(阶段)其对中国文论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影响程度愈益加大、影响层次更加深化。其次,这种影响的发生受到中国语境的本土化筛选和过滤,体现为一是其侧重点经常变化、转移;二是有时候在西方是历时的学说、理论,到了中国就被共时化了;三是这种本土化过程始终与有意无意的误读、变异和曲解相伴

随。再次,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本身不是高度统一的“铁板一块”,它包含着许多不同学派、学说和思想,有的在基本观点上相左甚至对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破坏性、解构性的和建设性、建构性的两种看似相反、实则互补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倾向: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旨在消解一切“二元对立”,充满着强烈的反权威、反传统的解构与批判精神,它强调颠覆和摧毁,反对理性,反对中心,反对终极和绝对,主张无规则和无模式;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则突出表现为某种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特性,它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力图建构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种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语境中同时发生着影响,不过有时这种影响大一些,有时那种影响大一些;有的影响比较直接、明显,有的影响相对间接、隐蔽。以上三个方面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被接受和发生影响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决不能简单化或绝对化地对待之。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学界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一涌入中国就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欢迎和大肆追捧,如一马平川、长驱直入,中国文艺理论界则不但毫无防御,反而热衷于对之全方位地接受、鼓吹和仿效。从这种估计出发,后现代主义文论甚至被有的论者看成为当代中国文论全盘西化的典型表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下面,笔者将用大量材料证明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之进入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文论产生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的过程,乃是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和博弈中发生、发展的。

19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闭关锁国已久的中国在文化上才刚刚开始受到现代主义文论和艺术思潮诸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等的影 响,并尝试应用于文艺创作实践,马上又发现在西方已经发展了二十来年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也开始悄然进入中国。对于后者,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其实还是相当陌生的,可以说基本不了解。那个时期对后现代主义文论主要还是以零星译介、初步评述为主,并没有出现许多后来者所描绘的那样“一蜂窝而上”的过热现象,也没有发现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挪、盲目

接受的情况,而是一开始就带有某种警惕性,在冷静、谨慎观察的基础上,有所鉴别、有所区分,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一二而已。仅以当时在中国讲学中最早较为系统介绍、论述后现代主义文论并在学界产生最大影响的美国学者詹姆逊来说,他那篇《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的中译文在《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发表时同步刊出的“译者按”,就在给予此文部分肯定的同时,不无谨慎地指出:“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只看到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区别,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詹姆逊 133),便是明证。

进入19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变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股思潮或平行或交织地同时在中国传播。不过,相比较而言,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势头有所减弱,而后现代主义文论则全面登陆与铺开,如本文前面所描述的第三、第四时期的状况: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接受热情日益高涨,传播的范围逐步扩大,译介的对象也大幅增加,对一批世界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理论家的著述,几乎做到了“一网打尽”;同时学界也呈现出研究论著密集、话题热点众多、争鸣意见分歧、参与面广泛等一系列重要特征。但是,即使这一时期,同样没有出现那种盲目崇洋、不分良莠、生搬硬套、全盘接受的现象。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同时遭遇积极引进和警惕抵制两种不同的声音。当时译介、研究、应用后现代主义文论者人数众多,也确实有一些人带有盲目性或者略知皮毛就迫不及待地竭力鼓吹,给人一种虚假的“后学热”感。然而,平心静气而论,这种情况并不占主流。真正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一批很有学术胸怀、气度和宽阔眼光、视野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当时走红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态度是非常理性、冷静和辩证的。我们拟以几位当时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文论传播、研究者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王岳川是1990年代初最为活跃的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引介者和研究者之一。^④他最早从理论上概括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它首先是一种文化倾向,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的问题;它是以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它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

定性,走向了精神荒漠和不确定性的平面;反中心性、反元话语、反二元论、反整体性的思维向度,以及重过程轻目的、重活动本身而轻构架体系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王岳川这些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性理论概括,后来被文艺学美学界广泛接受,产生了重要反响。他一开始就自觉地以清醒、反思的态度对待后现代主义思潮,他说:“我们应清醒地面对这一潮流,反思它的得与失,而不是盲目加入这一潮流中,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任何对后现代主义不加分析地赞同或否定,任何东施效颦般地照搬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都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应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焦点上,紧紧抓住后现代的二难处境这一关键,去真切透视其根本境况”(“后现代主义文化”48)。90年代中期,王岳川进一步从思维论、价值论与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三方面,论述了后现代主义在思维取向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肯定其促进中国文论、文化的当代转型等积极意义的同时,又强调对其在价值论层面上的虚无主义观念和“零度”艺术观,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175-85)。可以说,在此王岳川一人充当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传播者和批判者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角色,而且都非常成功,说明他超越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思维,达到了辩证思维的高度。

其实,在那个时期文艺理论界像王岳川那样一身兼二任的学者并不少见,有一定的普遍性。如王宁也在这一时期继续致力于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引介与研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一种怀疑,作为一种泛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和特征;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和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与现代主义既有着某种连续性,又不无断裂性;它的出现,标志着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文学艺术已陷入了难以挽回的危机之境地(这里明显受到詹姆逊的影响)。他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态度是,“我们应当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之进行考察、分析和批判”(“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子”48),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了解它、研究它,进而以我们的研究成果来和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学术理论对话”(“中国当代文学

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85)。这表明当代中国学者尝试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平等对话的立场。又如周宪试图从文化社会学观点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去分化”特征,指出,“后现代的去分化,并不是一种回归古典文化或现代文化那种总体文化的趋向,恰恰相反,在后现代文化中,一种破碎的片断的文化形态才是其主要形态”,他由此发现了一个“悖反现象”：“一方面是现代主义那种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被某种一元结构所取代;另一方面,整个文化又处于一种片断的破碎的和无中心的状态中,而生活在后现代的主体,则始终被一种片断感所笼罩”(36)。应该说,这已经超越了对后现代主义单纯引进、吸收还是单纯拒绝、批判的二元对立态度,而是进行实事求是的有深度的学理性评论。再如长期在美国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张旭东主张严格区分西方和中国的后现代问题。他认为,“在当代中国,严格的、技术性较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西方理论的寄生物,因为这套理论体系的具体分析对象是西方的。一旦我们的视线转向中国的具体现实,我们就会感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抽象性甚至空洞性。然而,这种抽象性、空洞性和不确定性也许正是我们探讨‘中国后现代’的切实出发点”(张旭东 17)。这个看法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强调后现代主义引进中国有一个适应性问题,不应该简单照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陶东风在这方面持更鲜明的批判性立场,他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不仅是认知问题,也是价值问题,必须把后现代主义置于中国当代文化形态的总体构成以及跨世纪中国文化的策略这一双重视野中来加以考察。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因素的过早出现会解构原本势头强大的现代启蒙运动,将陷于“失去抵挡价值虚无、意义沦丧的可悲局面”(陶东风 55)。换言之,对于后现代主义解构中心、取消意义和价值虚无立场应当加以警惕和批判。

这一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所持有的批判地借鉴、接受的态度,在当代中国学界是比较普遍的,居于主流地位的。

老一代学者基本上也是如此。如钱中文在90年代提出“新理性精神”文论时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批判性作了部分的肯定,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它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

人们思维方式改造,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以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精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上帝、国王、父亲、理性、历史、人文主义已经匆匆过去,虽然在一些信仰园地中余烬犹存。我们已杀死了我们的诸神’”。钱中文并不同意后现代主义这种全面解构,但是他对当今工具理性泛滥的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却完全一致:“旧理性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如今不断走向唯理性主义,科学理性逐渐变为极端化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人文理性在唯理性主义、实用理性的影响下,遭到严重的破坏。理性并未实现它的美妙的千年王国的许诺”,他严厉批判“旧理性、唯理性主义压抑人的感性,它们通过盲目的政治迷信,或是宗教的信仰主义,遏制人的感性的显现,扼杀人的人性的发展、个性的形成以及人的创造力”(43)。这种批判可以看作钱中文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部分接受,当然,他总体上是不同意后现代主义文论这种对理性的全盘否定和解构的。

毋庸讳言,当时学界多数人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引进和应用于中国文论、批评的建设,是持积极地、有分析地借鉴、吸收的态度的。如曾艳兵致力于讨论“后现代主义东方化背景及其过程”问题,认为虽然中国当代的社会背景同西方后现代主义背景有着许多根本差异,但中国当代之所以会接受、借鉴甚至横移西方后现代主义,固然同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渗透政策关系密切,更重要地还是因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近似的背景”(“后现代主义东方化”12)。他还进一步从本体怀疑论与怀疑本体论、诗的误读与诗无达诂、语言无意义与意在言外三个方面比较和探讨了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异同,认为两者的立场思路的一致性明显可寻(“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诗学”13-19)。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论相融合的具体思路,富有启发性。有的学者注意探究后现代主义文论深层蕴含的新型思维方式,肯定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们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指出:“任何一种文艺思潮都不会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存在的依据,而在总体上应该说,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的思考空间,不仅具有广度,而且具有深度,它启发我们不再‘单向度’地去思考各种问题,而是在思考问题时,也要对思考本身进行再思考”(姜静楠 29)。这些论者对后现代主义

文论思潮采取较为积极的吸纳态度,但是并没有盲目追捧,无条件吸收,而是有分析、有思考、有批判的。

与此不同,还有的学者比较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在1990年代的中国由盛而衰的原因,认为开始时因为它满足了当时中国三种不同的强烈精神欲求:第一,它具有一定的描述和解释功能,这可以满足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状的强烈愿望;第二,它为文化激进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精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第三,作为后现代主义一翼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也正中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下怀,使他们可以借此再一次掀起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浪潮,所以受到欢迎。但到90年代后期,随着这三层意义逐渐淡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正在由辉煌趋向没落,他预测,“后现代主义的出局,指日可待”(季广茂 71)。与此相似,还有学者在梳理1990年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师承与操作特征的基础上,既肯定后现代主义批评的学术史定位在于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话语,同时也察觉到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在中国已经由盛向衰的迹象”(谭桂林 5)。现在看来,这个预测不完全正确,因为后现代主义文论仍然以新的形态在中国继续发生影响。不过,在当时,这样一种预测,仍传达出部分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持清醒审视的态度。

当然,还有少数学者更着重强调应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消极影响采取警惕、批判的姿态,认为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存在着“盲目的吹捧”,强调“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坛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并将其消极性概括为四点:一是“由反‘释义’到消解理想和崇高”;二是“由消解雅俗到非雅崇俗、媚俗”;三是“由反‘逻辑中心主义’到反‘主流政治’、反‘主流意识形态’”;四是“由主张写作是一种游戏‘文艺不在表现什么,只关心如何表现’到寻找文艺写作的‘游戏规则’和‘表现技法’”(包忠文 19-20)。虽然这里将后现代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误读成“逻辑中心主义”,四点批判也不无偏激之处,但这种观点证明1990年代以来,国内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观点并不都是一面倒地肯定和盲目地接受的,事实上,警惕和批判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息过。

进入21世纪以后,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但没有逐渐“衰落”乃至消失,反而更加深化了——明显地向文化研究嬗变和深化,获得了时代新变。何以会如此?乃是因为世纪之交,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本土也开始出现后现代的语境。中外学界普遍认识到,全球化的语境也就是后现代的语境。我国有的学者精辟地指出,“中国虽属‘后发’国家,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无不受到世界潮流影响,文化发展同样不可能置身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向之外”(赖大仁,“图像化”154)。他还具体阐述道,“我们的某些文化形态中已经具有某种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显然还不能说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但从人们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念与趣味来看,却可以说超前进入了消费社会”(赖大仁,“全球化”5)。后现代主义文论、文化关注的许多问题就是这样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中悄然进入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思考之中。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外在于独特的中国语境,而是融入了中国语境之中,变成了中国文论自己迫切需要回答的内生性问题。换言之,在当今的中国,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种因素并置着,后现代因素虽然还不占主流,但是却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文化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就有了接受的内在需要和基础。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批判性接受的辩证态度和基本态势并没有变化,和1990年代基本一致。新世纪初,王岳川总结、反思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走过的接受历程,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现代性的激进批判和否定,在1990年代开始切入中国学术界,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捕捉并引入中国的文化争论之中,这一思潮似乎天生与中国文化有着某种缘分,很多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同样,后现代主义思潮自身的极端性、异质性和中国文化定位的复杂性使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分别持极其不统一的价值态度,其中既有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推行者,更有尖锐批判和反对者,也有温和的客观研究者。总体看,前期研究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占据了中国学界的主导地位,而当时步入世纪之交后,置身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人们便开始对后现代主义持更全面的、具体分析的态度(王岳川,“后现代

主义在中国的反思”5-8)。笔者认为,这一反思是符合事实的。

中国文论界前辈童庆炳认为,包括后现代主义文论在内的“西方文论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对其中的精华加以批判性的吸收,这是对人类文明果实的‘共享’,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把西方文论视为异端全面摒弃,和奉为圭臬几乎全面接受,这都不是可取的态度。毫无疑问,西方文论为我们打开了新天地、新视角,给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对我们开拓新的文艺学领域,建立新的文艺学体系大有帮助”(143)。这是非常辩证的态度。有的学者则更多地直接肯定后现代主义文论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作用,认为积极借鉴后现代的文艺学,有利于改变我们僵化的知识结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式(陈太胜)。也有学者侧重从学理上深入考察了后现代主义中重要形态——德里达解构理论与中国文学的不合适性,主张“我国文艺学界应对将德里达的概念和理论直接用于文学批评的做法进行检讨”(徐亮 66)。这两种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从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实际出发,严格按学理脉络来探讨对后现代主义如何接受的态度则不谋而合,都颇具说服力。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论界接受过程中呈现出的复杂性,认为从来没有一种主义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充满理论的悖论与张力,也没有一种主义有如此复杂的争论与接受心态,西方语境中的不同意见赋予了后现代主义新的、解构的、开放的特色,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接受从解构到建设,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心态逐渐平和、眼光逐渐宽广,“可以作为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典型案例分析加以研究”(董学文 宫铭 146)。中国的理论界对于这一理论最初颇为恐慌,接受过程中则一直交织着真伪之辨,也面临着激烈的反对意见,其本身也随着时代在改变。随着理论阐释的推进,可以看出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心态的变更,即一方面趋于开放与理性,另一方面也开始脚踏实地建设中国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笔者认为,这个带有总结性的回顾,是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的。

综上所述,近二十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传播和影响,就是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博弈中发生、发展的,在总体上是

健康的。少数学者在回顾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时批评国内学界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一哄而上、盲目崇拜、生搬硬套、全盘接受的态度,导致中国当代文论的“全盘西化”和失语。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中国文艺理论界在借鉴、接受外来理论思潮时的识别力、思考力和消化力。

三、积极与消极影响的交织互动: 以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讨论为例

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双重的,但总体上说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⑤笔者这里想着重指出,这双重影响进入中国并发生影响的最重要特点是:由于中国文艺理论界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进入的态度,始终处在借鉴、吸收和拒绝、批判的矛盾博弈中,所以其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不是可以分开或并列的,而是交织互动、不可分割的。这在它对人们惯常思维方式的冲击和改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文拟以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讨论为例,来说明双重影响交织互动的特点。

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后现代主义文论发生的最直接影响之一,当数历时多年的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讨论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正由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进入“在国内文论界激起了强烈震荡,最终引发了迁延至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这场学术论争构成了新世纪文艺理论界一个重要事件,它“已经为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涵盖面极其广、综合程度极其高的问题域或话语场。随着讨论范围的逐步拓展和逐步整合,所涵盖问题的一一呈现和深化,实际上已经从知识和思想价值两个维度触及到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最为深刻、最为隐秘的一些问题丛,极大地带动了学界同行们的话语热情,以致参与者甚众,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得到了充分表达,因此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推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党圣元 26)。虽然这场讨论的高潮已过,但是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世界性的争论,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核心问

题之一就是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所崇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反对认为事物、文本具有单一、固定不变的本质、因而以寻求这唯一本质为目的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观点和方法从90年代起已经通过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和渠道渗透和影响到文艺理论界,在中国语境中既遭遇到某些抵制或批判,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接受或认同。在199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大量涌入,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在笔者看来,所谓本质主义,应该主要指那种认为一切事物、现象都具有单一、绝对、固定不变的本质、因而学术研究以寻求对象这唯一本质为根本目的的思维方式。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在文艺理论界,本质主义长期以来成为多数学者(笔者本人亦不例外)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其突出标志表现是,认为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寻求文学固定不变的一元本质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的论述;而反本质主义则质疑文学是否存在单一、固定的普遍本质,主张将本质问题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进而质疑文学本质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后现代主义文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国文艺理论界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有力地冲击和撼动了我们许多学者长期以来形成的本质主义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使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合理方面为我们所吸收和运用;另一方面,在部分学者中,这种冲击和影响又有过“度”和走向极端之嫌。前者是积极方面,后者是消极方面。不过,这两种影响的发生实际上是相互交织、很难加以区分的,有时候体现在某个或某些学者身上,有时候则渗透在某个或某些理论问题上,很难一概而论。

据笔者观察,在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积极影响,首先体现在一批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者较早接受其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点,用来反思和批评中国文艺理论界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紧密结合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实际状况,批评那种认为文艺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全力寻求文学单一、不变的本质的理论思路,而致力于倡导文学的建构主义思考方式。这种反思

和批评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造成了相当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冲击,学界长期形成的习惯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很难突破的。

其次,被批评或受到冲击的一方在捍卫研究文学本质的合法性的同时,事实上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吸收了反本质主义的若干合理观点,比如有的学者有条件地肯定反对“独断论本质主义”是“对极端的、僵硬的、教条的本质主义”的反拨和挑战,部分肯定将文学本质问题探讨语境化和历史化的观点;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系统本质”观,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流动的,必须破除和摒弃对本质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理解”(陆贵山⁶),这种“流动本质”观与反本质主义观点已经相当接近。

再次,部分学者没有停留于对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全方位批判,而是自觉地尝试超越本质主义文论的理论建构,取得了可喜的实绩,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世纪以来南帆主编的《文艺理论(新本)》、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三本文学教材(也是著作)。方克强在多篇文章^⑥中论述了这三本教材的成就,指出它们“都对当下后现代语境的挑战作出了回应,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切割”,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着既反本质主义又着眼于系统性文艺学的建构工作。它们否定“本质”的客观性、永恒性和唯一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将“本质主义”非本质化和非唯一化。不过,它们打破本质主义、重新建构文学理论的策略各有不同:南帆采取了与本质主义相区隔的关系主义编写思路;陶东风则以“历史化与地方化”作为文艺学知识的重建思路;王一川的理论建构路向为“本土主义”。这三种教材虽然还是探索性的,还不够成熟,但确定无疑的是,它们都在反对绝对的本质主义、又尝试重构新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对此,方克强总结道:“告别本质主义之后的当下中国,单数的、大写的本质主义‘理论’失去光环后,出现了众多的、小写的反本质主义‘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方克强这一概括非常客观、精当,笔者完全赞同。

由上可见,论争双方的多数学者,在批判僵化、极端和教条主义的本质主义这一点上并没有

根本性的分歧。这本身说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合理内核已经深入人心,实际上已经悄然改变着学界习以为常的陈旧、僵化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不应小觑。

后现代主义文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极影响也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一是反本质主义这一方中有的学者在某些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过了合理的“度”而走向极端,比如认为文学不存在单一、固定的本质而提出“本质悬置”乃至本质研究取消论;比如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造成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模糊和文学的越界、扩容等情况,从而主张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等等。二是在对反本质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一方中,虽然那种典型、僵化、绝对的本质主义似乎并不多见,但是,有的学者对反本质主义观点加以全盘否定,指责其完全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根本看不到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东西,这显然也是片面的,而且很可能有重新退回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老路上去的危险。

由上分析可知,后现代主义文论在反本质主义问题上对我们文艺理论的影响不仅仅是双重的,而且这双重影响是交织互动的,有时候既是积极的,又表现出某些消极性;有时候看似消极,却包含着某些积极因素。关键在于我国文艺理论界在接受西方文论思潮时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态度,即有批判地接受和有接受地批判两种思路、方式的交锋博弈,而在此过程中能够达于某种动态的平衡。这种情况可以从最近两年来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延伸讨论得到证实。下面试举两个例子。

一是两位青年学者王伟和李自雄之间的争论。^⑦细读几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两位的基本立场并无根本分歧,总体上都是持反本质主义思路和观点的,只是王伟更为激进一些。王伟批评李自雄反本质主义不够彻底。他提出反本质主义可作两种稍有差别的读解,即反一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一主义,认为它们都反对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本质,但两者“在此后有没有文学本质上出现了分歧:因为前者之中就包含了数量可观的一部分学者,他们反对一元本质,但主张应该有多元本质;而后者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他把李自雄归属于前者,指出,“前者在反对本质主义之旅中打起了退堂鼓,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了本质主义的老路上”。显然,他自己属于“认为根本没有什

么本质”的后者。王伟认为后者主张“文学本质的建构性”,“将文学置于特定历史时空、特定关系结构中去理解与把握”,而不寻求“力图揭示出文学本质的宏大叙事”。他着重批评了李自雄关于“反本质主义能解构或已经解构的,是历史性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学本质;没有解构,也解构不了的是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的说法,认为这是承认了审美是文学“永恒的本质”。

不过,我们细读李自雄的文章,发现王伟对李文的理解有偏差。第一,李自雄认同王伟对两种构成结构的“反本质主义”的划分,但是指出自己“并不根本否定本质及其言说”,而王伟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本质”,更谈不上什么本质言说,即持一种“根本否定文学本质及其言说的‘反本质主义’”。这似乎没有歪曲王伟的意思。第二,李文同意王文反对对文学本质作出非历史的“一劳永逸”这种僵化的形而上的本质主义思维的理解,同意对文学的理解不能割裂历史,但同时指出,这却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质就不存在了,或是否定它的存在,而不用言说了”。也就是说,文学的本质问题还是可以,而且应该探讨、研究和言说的,只是不应当寻求文学单一(唯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可见,两人对反本质主义的理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其实,王文关于“一旦回到生生不息的历史语境之中,文学本质的建构性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来”的说法似乎表明他也不是完全否定对文学本质的研究和言说,前提是要遵循历史“建构性”的思路。第三,关于文学的审美本质问题,李文引用了赖大仁的如下观点来应对:“问题在于,事物的与时俱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度’的考量。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作为一个事物,是不是应当有一个最起码的‘质的规定性’,如果某一事物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或基本不具有了这种质的规定性,那么还能不能继续叫作该事物就值得怀疑了。在过去千百年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文学的形态和概念怎么变,作为文学‘质的规定性’的东西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和想象艺术的审美意义,而人们也正是以此来界定文学,并对文学作出解释的(赖大仁,“当前”43)。笔者赞同赖大仁的观点,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这里想补充一点,无论中外,“文学”这个词(概念)的现代意义都是19世纪以后才逐步建构、确立起来的。比如中国古代有诗、文、赋、词、

曲、小说、戏曲等等文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步被以审美为共同特质的“文学”概念统摄为一个整体。这个概念用审美来概括中国两千多年的各体文学的共同本质是合适、有效的;同时,到了今天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虽然文学的具体形态、体裁有许多新变,但是,审美这个“质”的规定性至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相对稳定和有效的。^④从历史语境和建构论角度看,文学这一层面的本质应当是可以研究和言说的。这并不等于本质主义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两人对反本质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但在文学本质能不能探讨和言说这一点上,王伟的彻底否定论恐怕有点过了“度”。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评价我们上文提及的体现了反本质主义自觉性、并有创新建构尝试的三本教材时,李自雄却持批评立场。他批评方克强把王一川《文学理论》的“感兴修辞学”归结为“本土主义”预设了某种排他性的本质主义思维;对陶东风的体现了“整合主义”思路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他更是认为只有解构而未能重新建构,只把问题敞开了而没有给出文学本质的一个最后结论,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还批评南帆《文艺理论(新本)》的“关系主义”思路是对福柯“权力话语的膜拜”是“另外一种本质主义”。对此,王伟作了批评,肯定了这三本教材在突破反本质主义同时所作的创新建构的努力。笔者基本同意他的观点,而对李自雄批评三本教材仍然是本质主义的看法,则觉得有点偏激和片面。

由这两位青年学者的争论也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特别是在中青年学者中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同时也是错综复杂的。其中,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是相互交织、难以分割的。

再举一例。最近读到的龚举善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⑤一文,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在文学本质问题上论述得最为辩证、深刻、有说服力的一篇文章,它既反对了根深蒂固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又坚持了文学本质的可言说性,并具体阐述了其有独创性的“多向生成论”,是对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争论的一个比较好的总结和综合。该文设问,“文学到底有无本质?或者说文学研究要不要对所谓文学本质进行必要的追问?”其答案十分明确:“文学并非没有本质,而是

没有固定一成不变的普适性本质”。这就肯定了文学本质问题探讨的合理性、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言说性。同时,该文分别讨论了制约文学本质的三大动因(要素),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的体制性规训,文化地理的非对称性限定,文学阐释的主体性认同,并逐一作了多方面、多向度的动态阐述,指出这些要素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非某一要素单向发力所能奏效,因而,所谓文学本质必定是由诸多主客观因素多向度动态式综合生成的价值指认,它的综合生成是后发式多源化流动性的,由此得出“文学本质多向生成”的结论,有力地否定了文学本质一元化认定的本质主义思维。这应当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积极影响的综合和消极影响的扬弃。当然,这篇文章并没有终结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但是,它的“多向生成”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注释[Notes]

① 如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治河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王宁的《多元并声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解构的踪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等。

② 比较重要的有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王宁的《后现代主义之后》(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张国清的《中心与边缘: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陆扬的《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方汉文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等。

③ 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陈晓明《后现代的间隙》(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后现代主义》(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金惠敏《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崔少元《后现代主义与欧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高宣扬《后现代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冯军《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研究》(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董迎春《后现代叙事》(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广利《后现代女权

理论与女性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毛崇杰《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江腊生《后现代主义踪迹与文学本土化研究》(山东:齐鲁书社,2009年)和《解构与建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郑宇等《后现代文学语境下的诗学与影像》(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严翊君等《后现代理论家关键词》(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

④ 王岳川与尚水合编了介绍后现代主义的译著《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又先后发表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学景观》、《后现代主义文化与价值反思》、《九十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等一批论文,从不同角度介绍与论证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的特征与走向。

⑤ 参阅笔者:“试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的积极影响”,《上海大学学报》1(2014):67-90;“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极影响的反思性批判”,《文艺研究》1(2014):39-50。

⑥ 参见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文艺理论研究》5(2004):67-90;“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再现世界’命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6(2006):89-94;“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2008):1-6。

⑦ 参见李自雄:“论‘反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重建”,《文艺争鸣》1(2012):20-27;王伟:“何谓文学学论争的‘中国问题’”,《文艺争鸣》7(2012):14-17;李自雄:“值得追问的‘中国问题’”,《文艺争鸣》1(2013):15-18;王伟:“反本质主义、文论重构与中国问题”,《文艺争鸣》1(2013):19-23。“关于反本质主义的三个关系问题”,《文艺争鸣》5(2013):32-35。以下引文均出自这几篇文章,不再一一注明。

⑧ 参阅笔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极影响的反思性批判”,《文艺研究》1(2014):39-50。

⑨ 参见《河北学刊》1(2014):79-83,以下所引龚文均出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包忠文:“要重视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影响——学习六中全会精神决议札记”,《群众》1(1997):19-20。

[Bao, Zhongwen. “We Should Take Seriously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Postmodernism.” *Masses* 1 (1997): 19-20.]

陈太胜:“走向后现代的文艺学:兼谈当代西方的几本文艺学教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2002):52-56。

[Chen, Taisheng. “Toward the Postmodern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With Reference to Several Textbooks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Fujian Forum*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Monthly) 1(2002):52-56.]

《当代外国艺术》(第十二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Contemporary Foreign Arts* Vol. 12.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0.]

党圣元:“本质抑或去本质、反本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研究的两种思路论衡”,《文艺争鸣》1(2010):26-35。

[Dang, Shengyuan. “Essence or De-essence, Anti-essence: Two Approache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esearch Since the New Century.”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1 (2010):26-35.]

董学文 宫铭:“从解构到营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战线》4(2008):146-51。

[Dong, Xuewen, and Gong Ming. “From Deconstruction to Construction: Postmodernism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Front* 4(2008):146-51.]

詹姆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行远译,《文艺研究》3(1986):123-33。

[Jameson, Fredric. “Realism,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Trans. Xing Yuan.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3 (1986): 123-33.]

季广茂:“从辉煌到没落——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命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4(1998):72-76。

[Ji, Guangmao. “From Glory to Decline: The Destiny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4(1998):72-76.]

姜静楠:“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源头”,《小说评论》6(1997):25-29。

[Jiang, Jingnan. “The Origins of Worldwide Postmodernism.” *Fiction Commentary* 6(1997):25-29.]

赖大仁:“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文学评论》2(2005):154-57。

[Lai, Daren. “The Expansion of the Visual and the Holding of the Literary.” *Literary Review* 2(2005):154-57.]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文论:何往与何为”,《文艺评论》5(2004):4-11。

[———.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Global Age: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Literature & Art Criticism* 5(2004):4-11.]

——:“当前文学面临的危机不容忽视”,《学术月刊》6(2006):41-46。

[———. “The Current Crisis of Literature Affords No Negligence.” *Academic Monthly* 6(2006):41-46.]

陆贵山:“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文学评论》5(2005):5-13。

- [Lu, Guishan. "On the Systematic Essence of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5 (2005): 5-13.]
- 钱中文: "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 《东南学术》2 (2002): 40-44.
- [Qian, Zhongwen. "Neo-Rationalism and Literary Theory."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2 (2002): 40-44.]
- 谭桂林: "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定位与质疑", 《中国文学研究》4 (1998): 3-10.
- [Tan, Guili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Post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Problems."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4 (1998): 3-10.]
- 陶东风: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文艺研究》1 (1993): 53-55.
- [Tao, Dongfeng.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1 (1993): 53-55.]
- 童庆炳: 《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研报告》。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 [Tong, Qingbing. *Field Research Report of the College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s in the New Period*.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6.]
- 王宁: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 《天津社会科学》1 (1994): 71-76 85.
- [Wang, Ning. "Postmodern Variant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1 (1994): 71-76, 85.]
- :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因子", 《理论与创作》1 (1992): 44-48.
- [- - -. "The Postmodern Factor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Creation* 1 (1992): 44-48.]
-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3 (1996): 175-85.
- [Wang, Yuechuan.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1996): 175-85.]
- :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反思", 《求是学刊》3 (2001): 5-8.
- [- - -. "Reflecting Postmodernism in China." *Seeking Truth* 3 (2001): 5-8.]
- : "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学景观", 《北京大学学报》5 (1992): 40-48 55, 《哲学动态》1 (1993): 35.
- [- - -. "The Spectacles of Postmodern Cultural Aesthetic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5 (1992): 40-48 55, *Philosophical Trends* 1 (1993): 35.]
- 徐亮: "德里达解构思想对文学理论的不恰适性", 《浙江大学学报》5 (2006): 66-73.
- [Xu, Liang. "Inadaptability of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 to Literary Theory."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5 (2006): 66-73.]
- 曾艳兵: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诗学", 《文史哲》2 (1997): 13-19.
- [Zeng, Yanbing.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Poetics."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2 (1997): 13-19.]
- : "后现代主义东方化背景及其过程", 《当代文坛》3 (1997): 12-15.
- [- - -.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Orientalization of Postmodernism." *Modern Literary Magazine* 3 (1997): 12-15.]
- 张旭东: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 《读书》12 (1999): 12-20.
- [Zhang, Xudong.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Modernity." *Reading* 12 (1999): 12-20.]
- 周宪: "文化的分化与'去分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化分析", 《文艺研究》5 (1997): 23-36.
- [Zhou, Xian. "Differentiation and 'De-differentiation' of Culture: A Cultural Analysis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5 (1997): 23-36.]

(责任编辑:王嘉军)